

第一篇 宏观理论研究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 科学的双向转移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创立时，需要它的创始人认真总结自然科学的成果；在其创立以后，同样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及时地总结自然科学的新成果。任何一个科学理论都是一个知识系统，它如果不经常同外界进行信息交流，就会落后于实践和认识的发展而增加它的无序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个开放系统。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应当同自然科学研究者建立长期、广泛的联系，信息、认识价值要双向流动，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双向转移。

科学认识的价值从一个领域移动到另一个领域，就是科学认识价值的转移。这是科学认识价值实现的一个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在自然科学领域实现自己部分的价值，自然科学也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实现自己部分的价值。这种价值的双向转移，会有效地促使各自价值的增值。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不断 总结现代科学的成果

自然科学的价值是多方面的，转移到哲学领域中的价值主要是认识价值。一般说来这种转移主要是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自然科学的新发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命题、某些结论提供新的佐证。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论需要不断用自然科学的成果来验证自己的科学性。不但因为哲学的结论必须以大量的、确凿的科学材料为依据，还因为这种验证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哲学结论能否被证伪？可以。但这种证伪不是三两个科学事实、三两项科学成果所能完成的。在验证自然科学理论的过程中，如果不存在什么判决性实验的话，在验证哲学理论的过程中，也不存在什么“判决性事实”或“判决性成果”。因此，如果有人认为现代自然科学的某些新发现的事实或新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时还不能对它作出恰当的解释，就宣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命题已被证伪，这是一种十分幼稚的看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真理，这已被一个多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所逐步证实。哲学结论验证的长期性需要我们不断用新的科学成果来强化这种证实。马克思主义哲学若能获得更多、更新的科学材料的支持，它就会更有说服力、号召力和战斗力，就能更好地战胜各种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观点。

第二、自然科学的理论概念、理论结论和理论思想经过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哲学概括，上升为哲学思想，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增添新的概念和新的结论。

马克思说：“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自然科学也应当是哲学知识的基础。自然科学知识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它包括对具体事实的陈述、具体的结论和比较普遍的结论。各个比较普遍的结论其普遍性程度也有差别。不同层次的知识同哲学的关系也不相同。一般讲

来，普遍性越高的科学知识同哲学的关系就越密切，同哲学知识就越接近，也就越有可能转化为哲学知识。在自然科学知识体系中，普遍性最高的知识就是科学思想。

科学思想主要指：(1)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基本观点。即自然科学的一般理论思想。(2)自然观思想。(3)自然科学方法论思想。(4)科学观思想。科学思想的后三种形式，本身就是哲学思想，但它主要是科学家在自然科学研究过程中提出的，常常是科学家对自己研究成果的哲学概括。科学思想的第一种形式则是自然科学知识中最可能转化为哲学知识的一部分。科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概括自然科学成果，主要不是概括它的具体陈述与具体结论，而是概括它的科学思想。自然科学认识价值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转移的基本形式，又可以表述为科学思想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本质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但这种反映必须通过自然科学这一中介才能实现。具体说，是通过自然科学知识的形式进入哲学研究领域而实现的。科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把自然科学家研究的关于自然界具体形态、具体规律知识的普遍性概括出来，形成哲学思想。

自然科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思想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自然界发展最一般规律的通道，这就是自然科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认识价值。自然科学的认识价值若不能在哲学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也不可能很好地增值。

二、现代科学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与启迪

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应当不断地向自然科学输送信息，转移价值，并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充分实现自己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它启发科学家的思维，指导科学家的研究活动。

针对 19 世纪自然科学界流行的轻视理论思维、轻视哲学的经验主义思潮，恩格斯曾多次阐述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并从爱护科学家的立场出发向他们发出了友好的警告。他说：“一个民族想要站上科学的各个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他语重心长地提出：有些科学家以为，他们只有忽视哲学或者侮辱哲学，才能从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是幼稚可笑的想法。“自然科学家可以采取他们所愿意采取的那种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一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呢，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形式的支配。”（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第 47、68 页）

恩格斯一百多年前讲的话，我们今天读来仍感到十分亲切。由于种种原因，近年来轻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在我国科技界又有所流行。这种倾向应当引起哲学和科学工作者的重视。因为它同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相悖。现代科学比近代科学更需要唯物论与辩证法。其根据主要是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恩格斯曾在 19 世纪中叶指出，自然科学当时从经验科学发展到理论科学，因此更需要理论思维。现代科学的理论性

比 19 世纪的科学更强，提出的理论问题更多，提供的理论思想更丰富，更深刻。即使是实验科学家，也必须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回答一定的理论问题，构造一定的理论模型，这就更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启迪与指导。

第二、现代科学还朝着总体化、综合化的方向发展，试图用单学科的知识来突破重大的课题，是越来越困难了。这在客观上就需要多学科的横向联合，实行多向的信息交流和多向的价值转移，形成整体的优势。现在出现了一系列的综合学科和横断学科，掌握和应用这些学科的知识，也需要哲学的头脑。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高度综合的科学知识体系，是科学家进行综合研究所必需掌握的思想武器。综合需要软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层次最高的“软科学”。

第三、现代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开拓了宏观、微观的新领域。我们人类属于宏观世界的一员，我们所直接获得的感觉经验只能是宏观的信息。当宏观的认识主体，应用宏观的认识工具来认识宇观世界和微观世界时，必然要遇到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比如，认识宇观、微观世界是否需要信息转换？应当如何判定这些信息的可靠性和有关知识的真理性？宇观、宏观、微观三个世界的规律性有那些共同点，又有那些不同点？对这些哲学问题持何种看法，已直接影响到有关科学的发展。

第四、即使在我们所熟悉的宏观领域，现在也在酝酿重大的突破。继爱因斯坦之后，以普里高津为代表的布鲁塞尔学派在这方面做了令人瞩目的工作。随着系统自组织理论、分子生物学等学科领域的发展，不可逆性、随机性、复杂性、模糊性等思想日益被科学界重视，有可能取代近代自然科学的可逆性、单义决定性、简单性和精确性的纲领。这将导致科学传统即自然科学基本

信念、基本原则的变革。将是科学发展史上一次最伟大的、最深刻的科学思想的革命，它将改变整个科学的面貌。显然，这场变革实际上是哲学思想的变革。在科学思想将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一个科学家若不用唯物论和辩证法武装头脑，或者将落后于科学的新发展，或者将迷失正确的方向。

现代科学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与启迪，这并不完全以科学家的个人意愿为转移。当代科学家在研究自然界具体规律时，不可能不涉及更为普遍的层次，这就必然要同这种或那种哲学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如果科学家的哲学思想发生偏差，就会影响他的自然科学知识功能的发挥。自然科学知识的价值就不能很好地实现。如果科学家自觉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的研究工作就可能减少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干扰。

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助于确立自然科学的研究课题与研究方向，它是评价自然科学成果的重要依据之一，它可以使科学家的理论思想和思维方式更加科学、合理。其中最主要、最基本的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进入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同自然科学的知识与理论思想相结合，或转化为新的科学思想，或促进新的科学思想的提出。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启迪，主要是对科学思想的指导与启迪。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代自然科学的这种认识价值，在认识物质微观结构的领域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实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强迫科学家遵守的法令，而是启迪科学家智慧的理论原则。科学家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要克服经验主义倾向，又要防止急于求成、追求立竿见影效果的短视行为。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关系到科学研究的方向 这是一件“长效事业”。不能认为今天读了一篇哲学

文章，明天科研课题就应当迎刃而解。作为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实现也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学好它非一日之功，掌握了它又会终身受益。

三、当前需要认真研究的 自然科学哲学问题

德国物理学家玻恩说：“真正的科学是富于哲理性的。”（玻恩：《我的一生和我的观点》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4页）我们还可以补充说：现代自然科学尤其富于哲理性。笔者认为，下列这些方面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很多的科学思想和哲学问题。认真概括这些方面的成果，可以大大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而这些方面的研究又急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

第一、物质观。列宁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后，自然科学对物质结构的认识有了重大的进展，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自由夸克是否存在，若夸克比强子重、是否意味着物质分割到一定层次可能越分越小，越分越轻？如何评价物质结构的“靴袪理论”？物质分到一定层次是否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再有更为基本的粒子？如何理解波粒二象性？粒子与场是否最终能找到一种统一的图象？如何理解虚粒子的本质？“虚粒子不虚”的物理含义和哲学含义是什么？是否所有的粒子都会有它的反粒子？负能量是一种实在的能量吗？正反宇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还是互相包含，成为一体？宇宙中除了我们所熟悉的可见物质以外，是否还存在着更多的、不可见的物质？物质与能量是否可以直接互相转化？现代科学进一步证实了列宁的物质概念的科学性，但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物质除了客观实在

性以外，是否还有别的基本属性？

第二、宇宙学。长期以来，整个宇宙的本质与状态只是哲学讨论的领域，现在天文学、物理学也可能从实证科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一古老的问题。宇宙大爆炸有哪些合理性与局限性？双曲型宇宙模型是否更为可取？在吸引占绝对优势的黑洞中，果真没有任何排斥效应吗？在奇点处，空间成了一个数字点，时间停止流动，一切因果关系都不复存在，这如何理解？如何评价霍金的黑洞蒸发的理论？如何评价爱因斯坦的弯曲的有限无边的宇宙模型？宇宙的哲学解与自然科学解有什么关系？自然科学能提出无限的宇宙模型吗？

第三、发展观。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自然科学能否回答世界发展的方向与机制？发展问题除了需要哲学探讨以外，自然科学能否从实证科学的角度给出一定的解释？究竟什么是简单与复杂、低级与高级？负熵的来源与产生的机制是什么？混沌状态的本质是什么？如何理解“非整数谁”的概念？无机界是否普遍存在着选择的机制？整个宇宙是一个向上的进化过程，还是一个向下的退化过程，还是一个大循环？如何理解可逆性与不可逆性、有序与无序的关系？协同学的研究是否表明对立面的相互协调也是系统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四、质量互变规律。分子生物学表明 基因、核苷酸的缺失和位置变化，在一般情况下都将使生物大分子发生质变。这是否意味着在某种情况下量变与质变合为一体，即并非所有质变都需要量变作为准备条件？同一种宏观物体可以有不同的量，而微观粒子的性质是通过量子数来表征的，微观粒子在量子数上具有全同的性质。对于一个原子来说，一颗原子、质子或中子的增

減是否都是一种质变？微观世界中的量变与质变的关系有何特殊性？

第五、规律论。经典科学认为 知道系统某一时刻的状态 就可以完全确定系统在过去和未来的任何一个时刻的状态。哥本哈根学派认为，量子力学只能对微观粒子的状态与运动作统计说明。现代生物学认为，环境的变化与基因频率的变化并没有一一对应关系，而是非线性关系。系统科学认为系统输出的现在状态，是由系统输入的过去状态按某种概率分布统计来决定的。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也强调涨落的作用。总之，现代科学更加重视偶然性、随机性的作用。那么，规律本身是否和偶然性不可分离？能否说世界本质上是一个概率的世界？单义决定论是否只是一种近似的描述？单义决定论同世界按规律发展的决定论、因果决定论有何关系？混沌学的兴起是否意味着对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新的突破或否定？

第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认识客体是认识主体以外的一种客观存在，认识的目的是认识主体如实地反映认识客体的本来面貌。可是哥本哈根学派认为量子力学的研究表明，主客体之间的界线是模糊的，认识活动是主体对客体的操作和干扰，要认识同主体无关的客体的本来面貌既不可能，也无意义，我们所能认识的只是主客体的关系。如何评价哥本哈根学派的这些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实践的作用，这同上述看法有何关系？在认识自然界的活动中“旁观者”与“参与者”是什么关系 如何理解主观的“介入”认识的结果取决于我们对认识方式的选择吗 这种观点同主观唯心主义是否有区别？仪器对认识过程和认识结果会发生什么影响？本体论中的主客体关系同科学认识论中的主客体关系有何异同？宏观的人在认识微观世界时，会遇到什么

新的问题？如何评价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

第七、人工智能与脑科学。人工智能的研究进展比较快，人脑认识自身的难度比较大，在这方面我们也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电脑能否完全模拟人脑？机器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取代人的脑力劳动？机器人能否像人一样有形象思维的能力，有情感和意志？未来的机器人能否超过并征服人类？裂脑人是否意味着人有两个精神？如何评价艾克尔斯的大脑与精神关系的二元论？大脑与精神究竟是什么关系？大脑贮存的信息能否通过化学的方法迁移？

第八、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历史的产物，科学的发展必然要引起思维方式的变化。现代科学思维方式与经典科学思维方式是什么关系？能否说经典科学以追求简单性、精确性为主，现代科学则以追求复杂性、模糊性为主？系统方法同矛盾分析方法有何关系？现代科学同经典科学在综合方法上有何区别？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思维方式对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有何影响？

第九、人与自然的关系。整个近代科学技术提出的一个基本口号是“征服自然”、“人类要做自然界的主人”。近几十年来，人口、资源、能源、环境各方面问题日益突出，人们认识到必须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有人甚至提出伦理原则也适用于自然界。能否说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而是“朋友”、“伙伴”的关系？怎样才能做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第十、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社会发展问题。西方新技术革命思潮强调科学技术、知识、信息、脑力劳动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强调研究社会发展的趋势，这是有意义的。但是，能否说人类社会只能划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科学技术以及所造成的生产力是否是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准？社会进步的根本动

力是什么？新技术革命同社会制度有何关系？新技术革命对不同制度的社会所产生的后果，有那些共同点和不同点？如何评价科学技术决定论、科学技术发展的乐观论和悲观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自然科学都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问题正是新发展的起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富有科学性，现代科学也更富有哲理性，这是哲学与自然科学发展的趋势。两者的关系应更为密切，应更好地相互启迪、相互促进。笔者相信，在这种互动作用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科学都将不断谱写新的篇章。

（本文原载 1993 年《广东社会科学》第 5 期，
获 1994 年江门优秀社科论文一等奖）

浅谈我国在经济建设上的初次探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经济建设上的探索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一些正确的初衷没有弄好倒引出一系列消极的后果，而一些明显的失误背后又不是没有某些合理的因素。在这里，任何形式主义简单化的评价都是有害的。一些漫画式简单化的判断和评价，固然容易造成轰动效应，但从根本上说，又极不利于说明问题和接受教训。我们应该学会对复杂问题作过细分析，则才利于我们制定跨世纪的发展战略。为此笔者根据若干流行说法不揣浅陋谈点一孔之见，作为借鉴历史经验的“引玉之砖”或“批判之靶”并以此就正于各位方家。

一、同样是想加速生产力的发展

必须在总体上对我国在建设上的探索有个全面性的公正估价。中国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探索无论是成功或失误，都是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贡献。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转型和中西文化交汇、冲突的大背景下，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换。不仅带领中国人民胜利地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由此成功地选择了社会主义，而且还带领中国人民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具体道路和模式进行过艰苦

卓越的探索，奠定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基础。我国在建设上的种种失误，跟这个伟大的探索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人在实践上对社会主义方式本身的初次探索是建国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时间；以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仅是对社会主义方向的探索；改革开放之后则是继初次探索的再次探索。现在，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显然远未结束，今后还会有若干次的不断探索。初次探索提出来的问题，大都带有贯彻始终的全局性质。因此，这些探索无论是成功经验还是失败教训，对我们来说同样都是极其宝贵的历史财富。实事求是并恰如其分地具体分析和理解这些探索，不但在理论上具有人类智慧的永恒魅力，而且在实践上还有十分现实的历史作用。在这里，任何形式主义简单化的做法都是有害的。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和探索，并非是凭空的主观愿望，而是对中国社会历史矛盾运动中面临的种种客观条件和客观趋势所作的实践回应。尽管对客观条件和客观趋势的估计，某些时候会脱离了实际，但党在实践上的回应都不是没有客观理由的。我们应该分析而不是抹煞这些客观理由。

我国在建设上的探索集中体现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样两条总路线上。时下不少人觉得，我们过早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匆忙搞什么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而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加速效应”又造成“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是“超越历史发展阶段”所带来的恶果。假如我们当时能认识到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可逾越性，“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晚些时候再搞社会主义，情况必定会跟现在很不一样。这些说法，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看，确实不无道理。但问题在于历史发展并没有“事后诸葛亮”的那些“假如”。其实党在建国初期的设

想，也是准备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等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成熟之后，再来考虑如何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党反复向人们说明，新民主主义跟社会主义是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甚至在作为当时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中也没有写上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以免引起不同革命阶段的混淆；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各种私人资本主义成分，也曾经是非常宽容的。基于中国经济的不发达，党和政府是考虑怎样利用那“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主义成分。大量的事实表明，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前，还是在这个胜利之后的最初几年，党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并没有设想要像后来那样“过早”地开始全面地对经济制度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更没有设想会像后来那样快就会全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来的变化并不是事先预定的，而是国际国内重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发展与党和政府在指导思想上相应变化两个方面交互作用的产物，亦即现实社会矛盾综合作用的结果。就一定意义上说，不是思想“超越”历史发展阶段而是实践不依人们的意志而“超越”了原先的设想。

就实践上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前因首先是为克服建国初期物资极度匮乏和普遍通货膨胀而采取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措施，利用行政的力量去稳定物价和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这个措施本身并不直接属于社会主义政策，但却为日后高度行政统制的经济模式跨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和积累了最基本的经验。与此相应的还有如何估计和对待翻身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以及伴随而来的某些“两极分化”现象，土改后出现新的贫苦农民使国家高估了“农村资本主义倾向”的消极作用。后来则是在帝国主义包围条件下为保卫人民共和国不受侵犯而赶快进

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在工业化对商品粮急剧扩大需求跟小农经济粮食商品率极为有限的尖锐矛盾下，特别是在私人粮商借此机会操纵粮食市场而危害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严峻形势下，为适应大规模工业建设而实施的粮油“统购统销”政策，给农业合作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作了进一步的关键性铺垫。过渡时期总路线刚提出时，国家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所采取的最初步骤，也还是比较慎重的。但在运动开展以后，出现了表面上轰轰烈烈而形成的某些“加速效应”，致使原定 15 年的改造任务 3 年完成。留下了“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等带来的一系列的遗留问题。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最初产生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后“扶私营工商业一把”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之中。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等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帮助私营工商业渡过了建国初期濒于倒闭的难关，带来了“中国民族资本的黄金时期”，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把私营经济系在国营经济的车子上。特别是当时国营企业劳动生产率大大高于私营工商业，再加上私营工商业也难以对付统购统销后的种种困难；所以私营企业由加工定货逐步转入公私合营，最初也是比较自愿的。逐步壮大起来的国营经济，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因而我国的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在开始时势头也确是不错的。此外，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等“三风”的急剧滋生，与此相应的还有私营工商业者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的恶性发展，引起大家对资产阶级的高度警惕。在国际上，则是“两大阵营”冷战对峙的政治格局和 50 年代“社会主义阵营”蓬勃发展的推动，另外还有苏联模式直接和间接的影响；60 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后则是